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后理论：
文化批评的新方向

马丁·麦奎兰
格雷姆·麦克唐纳
罗宾·珀维斯
斯蒂芬·汤姆森 编

Martin McQuillan
Graeme Macdonald
Robin Purves
Stephen Thomson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出品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外国文学研究文库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后理论： 文化批评的新方向

Martin McQuillan

格雷姆·麦克唐纳
Graeme Macdonald

罗宾·珀维斯
Robin Purves

斯蒂芬·汤姆森 编
Stephen Thoms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8-4544

This is a reprint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Edited by Martin McQuillan, Graeme Macdonald, Robin Purves and Stephen Thomson

© The Contributors, 1999

www.edinburghuniversitypress.com

This reprint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onl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理论：文化批评的新方向 =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英文 / (英) 马丁·麦奎兰 (Martin McQuillan) 等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6

(外国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5213-0106-9

I. ①后… II. ①马… III. ①文学评论—西方国家—英文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7809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负责 姚虹 徐宁
责任编辑 周渝毅
责任校对 都楠楠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16.5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213-0106-9
定价 42.0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301060001

| 编委会

主 编 金 莉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列)

车 琳	陈众议	程 虹
丁 超	高峰枫	姜 红
蒋洪新	金惠敏	刘亚丁
穆宏燕	乔国强	申 丹
史忠义	汪民安	王邦维
王炳钧	王丽亚	王 宁
王 炎	魏育青	薛庆国
杨金才	于 雷	张建华
张龙妹	张隆溪	张中载
赵 刚	赵国新	郑书九

前 言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策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文库”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学界同仁一直在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引进国外学者的学术著作，以提升我国的学术研究水平，增强我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但由于国外文学研究领域发展迅猛，以及国内出版经费缺乏等一系列问题，国外文学研究领域许多经典的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无法得到及时传播与出版。为了弘扬我国老一辈学者外国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组织策划了这套“外国文学研究文库”，旨在将国外文学学界的学术成果及时引进和介绍给我国外国文学学者、学生及爱好者，反映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趋势与前沿探索，使我国学界更好地与国际学界接轨与对话，以此推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外国文学研究文库”定位于对国外文学研究重要成果展开的

引介，将采用购买原作版权、组织国内该领域有影响的学者撰写导读的方式进行。这些导读将有助于读者把握作品的脉络，掌握其思想要点，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作品要义。鉴于英语之外其他语种作品的受众问题，除以英语撰写的著作以原文的形式出版之外，我们拟将其他语种的国外学者著作翻译成汉语，并附以专家导读。该“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系列丛书，我们将陆续推出国外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内容范围包括以下四个方向：外国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邀请到了我国重要学者参加编委会，推荐挑选国外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国内这一领域的资深学者将为著作撰写导读，并为非英语著作确定译者。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文库”，为拓展和深化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为帮助我国外国文学学者拓宽批评视野、开拓研究思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这套“文库”的出版，得到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众多学者的鼎力相助和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全力配合，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金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2018年4月18日

“后理论”及其对我们今天的 启迪和意义

——导读

面对当今文学理论的衰落和文学研究的低迷，来自东西方不同阵营的学者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我本人作为一个持有乐观态度的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始终对文学理论的现状不感到失望，而且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则更是抱有信心。但与此同时，面对文学理论在当下所面临的低迷状态，我们又不得不扪心自问：我们的文学理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学界总是听到“理论死亡”的声音？文学理论的现状究竟如何？它的未来前景又会如何呢？等等问题。因此，当我欣悉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准备编辑这样一套丛书时，不禁感到十分振奋。当金莉院长来信要我推荐书目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本《后理论：文化批评的新方向》（*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本人自新世纪以来投入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文学理论衰落后西方的文化理论现状及未来走向，或更为确切地说，是“后理论时

代”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现状 & 未来走向，¹ 我还就这个题目在一些欧美国家和澳大利亚的高校发表过演讲。据说，如果“后理论”这个术语并非我发明的话，那么“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al era）这一概念则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语境下都是由我率先提出并加以阐释的。当然，提出一个理论概念并非难事，粗粗浏览一下国内的学术期刊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光是在题目上冠以“后理论”三字的文章就不下数十篇。我想我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了。但是如何对这样一个理论概念进行界定和阐释、如何使其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并引起批评性的讨论则并非几十篇文章所能完成。此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本书的版权，无疑将推进这一理论讨论向纵深发展，我同时也希望中国学者就这个话题在国际场合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在这篇导读中，我将首先对“后理论”这个概念作进一步探讨，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提请我的国内外同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文化理论的盛期确实已经过去，我们绝不可能指望再出现一个理论包打天下的“黄金时代”。尽管一些持“理论之（已？）死”观点的人对理论的未来表现出悲观的态度，我却认为，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的功能和作用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限制，但理论本身并没有死亡。最近十多年里出现并风行于西方世界的“世界主义”、“后人文主义”、“性别研究”以及“动物研究”等理论思潮就表明了理论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

一般说来，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描绘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

1. 这方面可以参阅拙作：“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文景》，2005年第3期；“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与思潮走向，《文学理论前沿》，第三辑（2006）；穿越“理论”之间：“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和文化建构，台湾《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32期（2007年10月）；“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后理论时代”的后人文研究：兼论文学与机器的关系，《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再论“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比较恰当的。由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给传统的各人文分支学科带来了某种革命性的变革，而处于人文学科之重要位置的文学及文学研究则更是首当其冲，作为探讨和研究文学本体以及创作与批评规律的文学理论更是不能幸免。虽然文学理论，或曰批评理论，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结构主义衰落之后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西方形成三足鼎立之格局的时期，理论的作用和功能竟被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被用来解释所有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甚至被一些左翼理论家用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在理论的全盛时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竟然很少以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甚至很少阅读文学文本，以至于在学界竟然流行着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即一些冠以“文学理论”教授的学者所从事的并非文学研究，而是广义的文化研究。他们不仅在整个人文学科大行其道，甚至常常把思考和批判的触角伸进一些注重实证和经验的社会科学学科，这样，理论的不完备性和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这也正是理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一个原因所在。因而坚守理论的文学性立场的学者便抱怨理论的漫无边际和无所不在，希望理论最终将返回文学的领地。这些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理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它为什么不断地被人们诅咒“死亡”？为了探讨理论所处的境况以及在未来的可能发展，始终处于世界文学理论前沿的英美理论家率先作出了回应。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就是这些理论研究者对理论在当下的功能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反思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时过境迁，但是书中的导言及不少文章中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国际上推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则更是不无启迪意义。

首先我交待一下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缘由。针对文学理论界出现的种种令人忧心忡忡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一些专事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学者于1996年7月4—6日聚集在格拉斯

哥大学，举行了一个探讨理论衰落之后的状况的研讨会，会后的精选论文结集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后理论：文化批评的新方向》。这大概是“后理论”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时候，但是我们阅读此书后便不难发现，此书所指的“后理论”主要还是指以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并没有涉及后来新崛起的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这些“后理论”更没有在整个国际文论界广泛被人们使用并引起讨论。而在今天，曾经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和启迪的各种“后理论”均已独占鳌头，而“后理论”概念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所有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后理论”开始出现时意味着什么？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

在本书的短序中，英国著名的左派政治学家、埃塞克斯大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厄内斯托·拉克劳开宗明义地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之命运真是奇特的，一方面，我们自然是一直在经历着模糊经典的疆界之进程，这一进程使得“理论”成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在一个对元语言功能进行多方面批判的时代，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又摆脱了严格区分的理论框架/个案研究的紧箍咒。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却又不能对抗一种脱离了理论的羁绊而蓬勃发展的经验性……因此，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理论世界，但我们肯定又不可能处于一个非理论的时代(v)。²

这就说明，在“后理论时代”，并不是没有理论，提出“后理论”主张的学者并非要全然摒弃理论。那么他们对理论抱什么样的态度呢？如上所言，他们只是想限制理论的大而无当性和被扩大了的不恰当功能，使对个案的经验研究置于理论的框架并加入一些理论的

2. 本导读中的引文除另外注明出处外均出自本书，本导读仅标明页码。

色彩。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四位编者在其合著的一篇题为“理论的愉悦”（*The Joy of Theory*）的导言中对“后理论”的含义作出了这样的阐释：

因而后理论不只是一种未现身却有着潜在可能的理论，它倒更是一种甚至不可能被充分激活的理论（思想的经验）。后理论是一种思想的状况，它在这样一个状态中发现自身：一个不断延缓的状态、一种自我反思的立场以及一种不断地在与理论的盲点进行谈判中自我取代的质疑的经验（xiii）。

这就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已失去了以往的那种活力和穿透性，它逐渐变得越来越崇尚经验，并注重反思和质疑自身，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充分彰显其批判锋芒了。因而在不少人看来，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已经衰落甚至死亡。这就是早期的理论研究者对“后理论”的描述和界定。但我认为，后理论主张的提出旨在说明，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已经渗透在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批判对象，同时也在于反思自身。后理论概念的提出，使得日益缺乏活力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又在某种程度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我结合理论在中西方的发展现状，率先在中文语境下提出了我本人的后理论主张，但我在当时并未读到英语世界的这本专题研究文集，我提出这一主张主要是受到另一事件的启发和激励——就是我的老朋友特里·伊格尔顿的一本小书的启发。³

进入21世纪以来，对理论的未来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态度越来越悲观。这尤其体现在毕生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英国文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

3. 非常具有巧合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也是我撰写的导读。

著作中。在他那本曾在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专著的一开始,伊格尔顿就发出这样的哀叹:“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萨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⁴ 作为一位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上述这番哀叹至少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曾钟情于文学及其理论的学者的无可奈何。而伊格尔顿的态度尤其悲观,他甚至对自己曾经热情鼓吹和阐述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在今天是否存在或有用也表示出了怀疑,因此他在书中用了“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这个宽泛的术语,用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对于伊格尔顿的这一激进态度,不同的理论家自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尤其在理论界和文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反应当推2004年美国的跨学科理论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推出的一组文章。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出版后,2003年10月11—12日,《批评探索》编委会在芝加哥举行了会议,讨论了该刊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讨论了批评理论在跨学科诸领域的状况。这组文章实际上就是该刊编委会对“理论的死亡”作出的集体回应。此外,一些有影响的单个文论家也在不同的场合作出了反应。例如,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的反应几乎是保持沉默,而他却一反以往泛泛讨论“理论”的做法,强调理论的“文学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出版于2007年的专题研究文集《理论中的文学性》(The Literary in Theory)中。卡勒除了在该书导论的注释中淡淡地提及了《理论之后》这本书外,甚至连其作者的名字都未提及。但他却在多处强调,“理论并没有死亡”,它与文学已经融为

4.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1.

一体，也即讨论文学离不开理论的视角，而理论的阐释中又不无文学性。⁵我想这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态度。卡勒于2011年应我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等中国主要高校作了巡回演讲，他在演讲中描述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方向，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向：（1）叙事学的复兴；（2）更多地谈论德里达而较少谈论福柯和拉康；（3）伦理学的转向；（4）生态批评；（5）后人文研究；（6）审美的回归。⁶

当然，对理论的命运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另一位对法国理论十分熟悉的理论家让-米歇尔·拉巴特对理论则抱有更为乐观的态度，他早在伊格尔顿之前就预示道，“理论从来就没有停止回归，这一点已被数量众多的文选、导读、指南以及新的介绍性读物所证明。如果理论被还原为其本身的幽灵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十分凸显的幽灵不停地行走并晃动在我们古老的学术城堡中。”⁷当然，文学理论虽没有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死亡”，但是确实，它曾有过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但是理论在西方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处于衰落的状态。作为一位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学研究者，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参与到国际文论界对文学理论的现状与未来的讨论中，尤其是当理论从西方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时，它的意义和功能有可能发生变化，有时甚至已经出现了与理论的出发点截然相反的状况。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近十多年来文学和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持续兴盛见出端倪。对此，我和我的美国同行也曾在英

5. 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

6. Cf.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Today," 2011年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7. Jean-Michel Rabaté, *The Future of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02, p.10.

语文学理论界作出过相应的反应。⁸ 这也算我本人在国际场合对“理论死亡”论作出的一个回应。

在中文语境下，鉴于不少专注作家作品研究的文学学者对理论的不以为然，我本人近十多年来接连发表了多篇论文，全面阐述理论衰落之后的状况以及“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态势。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已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没有大一统理论话语的时代，但是各种理论思潮却可以在自己的有限空间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关于“后理论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精神，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作过描述。在这里我只想指出，文学理论虽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且不断有人报告“理论已死”，但文学理论仍有着广阔的前景。它虽然无法回到过去曾经有过的“黄金时代”，但它永远不会消亡，但是理论本身曾有过的“无边的”作用和不恰当的功能必须加以限定。

那么，人们也许会进一步问道，在后理论时代，还有什么有活力的理论思潮呢？我想，这应该是一篇专门性的学术论文的题目，本导读只简略地涉及一些受到各种后理论启发应运而生的新的理论思潮。它们虽然目前主要风行于西方世界，或者更具体地说主要风行于美国，但却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界关注了。

“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功能及未来走向

持有理论的“终结”论者并非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才有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现任教于美国纽约大学的英国后殖民理论家罗伯特·扬就在一篇文章中宣告，“后结构主义”的衰落意味着“理论的终结”，⁹ 但是理论依然步履艰难地又走过了三十多年。它显然没

8. Cf. W.J.T.Mitchell and Wang Ning, "The Ends of Theory: The Beijing Symposium on Critical Inquiry",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No. 2 (Winter 2005): 265 - 270.

9. Robert Young, "Post-structuralism: the end of theory," *Th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5(1982), (1 - 2), pp. 3 - 20.

有像扬所预言的那样已告终结，而是在迅速调整自身后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并且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扬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后结构主义，但即使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也没有很快就寿终正寝，而是熬到了2004年德里达的去世，后结构主义才算真正地趋于终结。文学和文化理论才算真正进入“后德里达时代”，或曰“后理论时代”。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当今这个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功能和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是否就变得暗淡了呢？理论是否就没有用了呢？关于前一个问题，我下面会着重回答，而对后一个问题，我们则可以从最近一些国内刊物的文学编辑所面临的一个实际情况得到回答：一方面大量的来稿或者只是老生常谈，或者在文章中对国外的理论思潮仅作泛泛的介绍而缺乏深入的思考，或者只是把所要分析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故事重复一遍而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另一方面，具有真知灼见和理论深度的学术论文又是那样缺乏，因此这些编辑不停地跟踪约请有实力的作者赐稿，但仍难以获得优秀的论文。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西方学界也不鲜见。但是西方学界的一些著名文学理论期刊的主编则别出心裁，他们经常委托学界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去约请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某一个话题撰文，并编成主题专辑，这样便对文学研究起到某种导向的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理论界出现的理论思潮的频繁更迭和此起彼伏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一些著名的理论学术期刊的左右。由此可见，并不是理论本身没有用，而是理论尚没有被恰当地运用到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分析研究中。

关于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及走向，一直是东西方理论界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方面，国际文学理论界的顶尖学术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确实起到了引领潮流的重要作用。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学界，就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文学理论在新世纪的发展。80年代后期，美国文学理论家、《新文学史》

杂志的创刊主编拉尔夫·科恩组织了一批在西方文学理论界十分活跃的理论家和学者撰文对文学理论的现状作出总结，并对其在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一番描述和预测。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率先在《新文学史》上陆续发表，之后由劳特里奇出版社结集出版，定名为《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1989)。也许是由于为这部文集撰文的各位作者的名气和影响，同时也由于主编本人在欧美文论界所处的领军地位，这部专题研究文集在当时的西方文学理论界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对于行将式微的文学理论的重振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之后，这部文集于90年代中期被译成中文，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不禁要问，文学理论在当下的境遇又如何呢？这部文集的主编以及各位作者的预言是否已经应验？这里简略探讨文学理论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2004年德里达的去世使得解构主义和各种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失去了其最重要的代表性理论家，在这样一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解构的大潮消退，解构理论本身也裂变为碎片，渗透到当代西方的各种后理论话语中，导致了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格局的形成。但另一方面，这些后理论大都程度不同地从德里达那里继承了解构的遗产，并向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现代性发起了新的挑战。在这些后理论中，后人文主义一马当先，向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念人文主义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消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人类唯我独尊和不可一世的神话。而在此之前，另一些受到后理论启迪的批评理论也不甘示弱：生态批评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契机，无情地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使人类从高雅的神殿又返回到自然万物中；酷儿理论模糊了性别的差异，为一种双性共存和性别变更的取向奠定了基础；动物研究则更是在弘扬动物性的基础上呼唤一种普遍的动物伦理学。应该承认，这些理论思潮共同形成了后理论的中坚力量。目前这些理论思潮在西方学界正方兴未

艾，值得我们专事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密切关注。

如果说，上述后理论思潮大都显示出“非政治”或“非意识形态”的特征，那么另一些早先兴起但现在仍有着较强生命力的理论思潮依然占据着当下批评理论的相当一部分想象力。后马克思主义或曰新马克思主义仍有相当大的理论空间，它始终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资本及其对贫困国家的掠夺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只是批判的锋芒不如早先的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犀利；后殖民主义在经历了理论的争鸣和演绎之后把研究的触角指向殖民主义的源头，并开始关注殖民地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新历史主义虽不再如早先那样引人注目，但它的批评教义早已渗透到历史的重新思考和叙述之中。横跨人文和社会两大学科的世界主义的兴起则消解了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使得文学研究者重新关注并建构新的世界文学和世界文论话语。所有这些理论思潮也和上面提及的更为新锐的理论一起构成了后理论时代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理论的“黄金时代”虽不再来，但理论的多样格局和多元话语的共存却形成了后理论时代的特色。我认为，这就是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后理论”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意义

如前所述，“后理论时代”已经来临，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我们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工作者有何意义呢？我们经常说，我们只有抓住机遇才有可能发展自身，那么“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为我们提供了何种机遇呢？我认为，“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为我们非西方理论工作者步入当代理论的前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我经常在和我的西方同行进行交流时指出，文学理论在西方遇到了困境，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遇到了困境。坦率地说，中国是一个文学理论大国，仅各高校从事文艺学和比较文学教学的教师就数量众多，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专事文学研究的